

帝王与晋祠考略

□ 左正华

太原晋祠为晋国始祖唐叔虞的宗祠。自晋祠创建以来,历代帝王或在晋祠树碑刻文,阐述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或在晋祠大兴营建之风,建祠立庙,歌功颂德,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或对晋祠进行册封,下诏改名,以安抚百姓,巩固其统治。晋祠浓厚的文化氛围中体现出历代统治者政治斗争的信息、安邦治国的策略。晋祠与帝王是互动的,也是关联的。本文拟通过探讨晋祠与帝王的关系,揭示晋祠在中国祠庙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周成王、姬虞和晋祠

谈论晋祠,不能不言及姬虞。姬虞,姓姬名虞,是周武王姬发的幼子,周成王姬诵的弟弟。其母邑姜,是姜尚之女,周武王之妃,被后世尊为圣母。武王死,成王继位,封虞为唐侯,故名唐叔虞。

关于姬虞的诞生、命名和封唐,《左传》、《吕氏春秋》、《史记》等史籍,都记载了一个颇具神话色彩的故事。其中,《史记·晋世家》载:“唐叔虞者,周武王之子而成王之弟。初,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谓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圭以与叔

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1]。

封侯建国、封土建国,本是西周初期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而史书却把叔虞封唐这样一件严肃重大的政治事迹描写成一场荒唐可笑的儿童游戏。显然周成王“桐叶封弟”的故事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应有史学上牵强附会的意味,自不足信。唐代柳宗元还专门写了一篇《桐叶封弟辨》的文章,论证了桐叶封弟的虚妄和不可信。但叔虞封唐的历史却是真实的,毋庸置疑。

西周实行的是诸侯分封制,推行宗法制度下的封建。所谓封建,实际上是封侯建国,封爵。具体说就是将周王的嫡系子弟、王公贵族、有功之臣封到各地做诸侯,建立自己的侯国。诸侯有独立的军队,有私有的土地,管理土地上的人民,还要对周王承担一定的义务,如定期朝见,缴纳贡赋,征调军队随周王出征,负责保卫王室,“以藩屏周”^[2]。当时,与分封制密切相关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宗法制,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即嫡长子继承父亲的宗主地位,庶子进行分封。其将权力继承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形式



唐叔虞祠



唐叔虞像



唐碑 《晋祠之铭并序》



圣母匾

固定下来,以解决贵族间的矛盾,巩固分封制。分封制与宗法制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嫡长子与分封下去的众子有双重关系,在亲缘上是兄弟关系,在政治上又是君臣关系。

叔虞作为武王子,成王弟,从宗法制度看,被封诸侯是非常正常的。这也正是周代藉由宗法制和封建制能纲纪天下的两个重要的原因。

那么,叔虞所封唐地,究竟在何处?千百年来,说法不一。自班固、郑玄、杜预、酈道元、朱熹,到阎若璩、顾祖禹、全祖望、朱圭、范文澜等人,都认为叔虞所封之唐在今太原市晋源区晋源镇一带。王泰、顾炎武、徐继畲、王轩等人考证叔虞所封之唐在晋南的翼城一带。马斗全等人主张叔虞所封之唐在今永济一带。近年考古界也多从晋南说^[5]。以上说法各有不同,但叔虞封唐之地“河、汾之东”却肯定在山西一带。

成王在周公的辅佐下封叔虞为唐侯时,曾在都城镐京(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举行了盛大的分封典礼。《左传·定公四年》载:“(成王)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之甲),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叔虞封到唐国做诸侯后,治国施政非常得法。

当时唐地既有夏人后代,又有戎狄等少数民族,故叔虞用夏政去教导夏民,以戎法来治理戎人,即所谓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又开拓疆土,大兴水利,广垦农田,发展农业,政绩斐然。当时,唐地出现了二苗同为一穗的奇异嘉穀(禾或谷),叔虞认为这是天赐祥瑞于人君的吉兆,遂将此表示丰收在望的“嘉禾”献于成王,得到了成王的褒扬。成王又命叔虞到东土馈赠周公。周公为此作《嘉禾》诗,以示颂扬^[6]。

叔虞去世后,其子燮父继位,因境内有晋水,遂改唐为晋国^[5],人称晋侯。以后,人们在悬瓮山麓、晋水源头处建祠立庙,叔虞受人祭祀,享受祭飨。祠称晋王祠,又名唐叔祠、晋祠。

晋祠,创建年代不详,但主祠圣母殿左右两侧各有一古柏,距今三千年^[6],可知其历史之悠久。从现存的史料看,至北魏时已有详细的记载,酈道元《水经注》曰:“沿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以后经北齐、隋、唐至明、清代代修葺、扩建,晋祠乃成今日之集山泉、灵木、园林、古建、雕塑、石刻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

周成王、姬虞与晋祠虽无直接的关系,但有必然的联系。正是因为周成王剪桐封弟,晋祠才得以创建和发展,叔虞才被历朝历代所供奉和祭祀,也才成

为今日之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晋国是宗法制度下土地分封的产物,晋祠是这两种制度的实物孤例,研读好晋祠,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两种制度维系了中国几千年帝王时代长盛不衰的根源。

如果说唐叔虞祠在建立之初本身就具有宗庙祭祀、保佑唐国(或晋国)的功能,不如说它传承了西周社会演进的特殊内涵:分封制和宗法制不但是维系西周社会的根源,而且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发展相始终。从这层意义上分析,晋祠作为西周初期宗法制度的实物佐证,作为土地分封的历史见证,在中国现存的祠庙建筑中独一无二。这就使得晋祠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既有了其普遍性的一面,又具有了特殊性。

二、北齐文宣帝高洋与晋祠

高洋(529—559年),字子进。其先为渤海蓨(河北景县西)人,曾祖父高谧曾任北魏御史,父为北魏大丞相高欢。

高洋少时,深沉有大度,处事果断,外柔内刚,深得高欢喜爱。史载,高欢曾以时事考问高洋,高洋总有独到见解。

东魏天平二年(535年),高洋被授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左光禄大夫、太原郡开国公。武定元年(543年),加侍中。二年,转任尚书左仆射、领军将军。东魏武定五年(547年),高欢病死,长子高澄继承父亲的职位,仍为大丞相,继续把持着东魏政权。次子高洋此时为尚书令、中书监、京畿大都督,摄理军国。

东魏武定七年(549年)八月,高澄被刺,高洋回到晋阳,执掌东魏政权。八年正月,高洋被授为丞相、齐郡王,不久又进爵为齐王。五月,高洋由晋阳至邺,进位相国,总理朝政,接着便行禅代之事,贬东魏孝静帝元见善为中山王,自立皇帝(即文宣帝),定国号为齐(史称北齐),年号为天保,定都邺城(今河北磁县)。

高洋称帝后,实行改革,加强中央集权,“罢相国府,留骑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别掌机密”^[7]。又整顿吏治,革除贪风。重用杨愔,制定《齐律》。分居民为上、中、下三等,使富户纳税,贫户出力。同时减轻百官之禄,撤除军人常廩,以节国家费用。又省州并县,稳定政局。军事上拓土开疆,出击柔然、突厥,扩充地盘,同时不惜民力,大修长城。

北齐政权不但在政治、军事上倚重晋阳,还在经济、文化和城市建设等方面依托晋阳。

高洋崇尚佛教,称帝后便屡兴土木,创修台殿佛寺。晋阳为高欢、高洋父子起家之所,故高洋将晋阳定为别都,扩建晋阳。天保二年,高洋派人在晋阳周边兴建了规模宏大的法华寺(又名开化寺,在今太原蒙山),并在其上开凿高达200尺(约66.6米)的西山大佛,又在晋祠外围建崇福寺。天保七年,又在龙山(今太原西)修建童子寺,凿石佛高170尺(约53米),俗称龙山大佛。在天龙山继高欢凿两石窟后又增凿三窟(东峰1号窟,西峰10号、16号窟),在中国石窟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天保九年,高洋又在晋阳兴建大庄严阁,用以庇护法华寺大殿。

高洋皇帝常居晋阳,喜爱晋祠山水,刻意营建晋祠,派人在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塘”^[8]。先建了难老、善利泉亭,又筑大池,架飞梁于水上^[9],筑流杯池,引善利泉水入智伯渠,扩大晋水的流量。此外,在祠内建起了均福堂、清华堂、宝墨堂、仁智轩、流杯亭、环翠亭、涌雪亭等亭堂建筑,在祠外悬瓮山上建读书台、望川亭。晋祠随着北齐皇帝高洋的重视和营建,很快便成为北齐别都晋阳的一大名胜区,即所谓的皇家离宫别苑。当时官吏无不以游晋祠为幸事。史载:“自洋以下,皆游集焉。”^[10]晋阳名士王晞常诣晋祠,赋诗曰“日落应归去,鱼鸟见留连”^[11]。此是晋祠大发展时期。

高洋虽极信佛教,大兴晋阳城,修筑佛寺,扩建



圣母像



“三晋遗封”匾(清慈禧太后题)

晋祠,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却是历史上少有的一代暴君。既杀戮北魏宗室,又残害同胞兄弟,其暴虐程度可见一斑。

天保十年十月,高洋暴卒于晋阳,年31岁。其统治时期,内与西魏(后北周)对立,外与少数民族柔然、突厥抗争,国土安稳。

高洋在晋阳周围及晋祠祠内创建的佛寺祠堂,现在难以见到,但仍有一些痕迹可寻。如崇福寺在晋阳城西南的晋祠东面,今荡然无存,只留尚能说明北齐时以寺命名的“南大寺”、“北大寺”村村名。童子寺在晋阳西南2.5公里的龙山之巅,为高洋派高僧宏礼于天保七年(556年)创建的寺院,当时规模宏大,摩崖造像奇伟,时至今日,仍有一座北齐天保二年雕刻的燃灯石塔保存于该遗址上。近几年龙山童子寺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而《北齐书·唐邕传》也载:“显祖(高洋)尝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为何等城?’或曰:‘此为金城汤池,天府之国。’”^[12]开化寺在晋阳西北五公里的蒙山,当时寺院分前后两座,颇为壮观,附近的开化村、寺底村、开化沟,均以此得名。后寺依山开凿的蒙山大佛(西山大佛),虽高度略次于乐山大佛(713-803年),但开凿时间却比后者早162年。该佛像前后开凿20多年(551-576年),故至北齐幼主时,“夜则以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百工困穷,无时休息。凿晋阳西山为佛像,一夜燃灯万盆,光照宫内。”^[13]可见当时开凿石佛的壮观场面。至于晋祠祠内北齐高洋修建的清华堂、流碑亭、宝墨堂、环翠亭等亭堂现已无痕迹可寻,但现在的难老、善利二泉亭、鱼沼飞梁和八角莲池及祠外的望川亭等景点则是历代在北齐的遗址上重建的。近年在祠内整修中发现了北齐的砖、石柱,即是最好的例证。

北齐后主高纬,因崇信佛教,于天统五年(569年)将晋祠改名为大崇皇寺^[14]。至此,晋祠这一祭祀

唐叔虞的祠庙披上了佛教的外衣,祠庙内从此多了佛教的建筑、寺院,这是晋祠多宗教色彩的开始。

三、唐太宗李世民与晋祠

李世民(599—649年),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青年时期,李世民随父太原留守李渊入居晋阳,习文练武,才华出众,人称“太原公子”。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617年,李世民专程前往唐叔虞祠(晋祠),祈祷唐侯保佑他旗开得胜、扫平群雄、一统中原,成就帝王大业。然后,辅佐其父李渊起兵晋阳。618年,李氏父子推翻了隋朝统治,因太原(晋阳)为其发迹之所,又是叔虞所封之地——唐国,遂定国号为“唐”。626年,李世民因“玄武门之变”登上了皇位,是为唐太宗,改年号为贞观。

贞观年间,唐朝国力强盛,百姓富足,政治、经济、文化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水平,史称“贞观之治”。贞观十五年四月,唐太宗准备来年二月到泰山封禅。五月,有太原老者和僧人前往都城,奏请世民封禅时绕道晋阳,临幸王业之基太原。李世民说:“飞鸟过故乡,犹踟躅徘徊,况朕于太原起义,遂定天下,复少小游观,诚所不忘。”^[15]答应前去太原。

贞观十八年(644年),李世民亲率六军,浩浩荡荡东征高丽,苦战一年,却以失利而班师回国。贞观十九年十二月,李世民回到晋阳养病。贞观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李世民在长孙无忌、萧瑀、李勣、张亮、李道宗、杨师道、马周等七大臣的陪同下驾幸晋祠。他瞻仰了晋祠的千年古柏,流连于难老泉水。此时此刻,他对晋祠的山水草木、一景一物,都有特殊的感情。他立在晋水源头,仿佛太原起兵时祈祷唐侯的情景就在昨天,可谓“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16]。他驻足唐叔虞祠前,想起了保佑自己夺取天下的唐叔虞,当年的理想已经变成了现实,“昔骑匹

马去,今驱万乘来”^[17]。如今天下太平,如何才能使唐王朝永远强盛下去?想到这里,唐太宗不禁感慨万千,思绪重重,遂亲撰铭文,祭祀唐侯,又命手下刻石立碑,留下了千古不朽的《晋祠之铭并序》碑。

李世民《晋祠之铭并序》碑,通高3.55米,宽1.2米,厚0.27米。全文共1002字,为一篇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政治与抒情绝妙结合的骈体佳文。作者巧妙地将晋祠的自然景物人格化,将治国理念自然化,以此总结了西周以来的历史经验,又从描写晋祠建筑、山丛、泉水等景物中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治国思想,即“非亲无以隆基,非德无以启化”。碑文既对晋祠充满了感激和感恩之情,又阐述了君权神授的思想,肯定了其继承帝位的合法性。他认为,以唐代隋是天意,贞观之治也依赖于神功,一切缘于周成王“剪桐颁土”、叔虞封唐的史实。晋祠山水是真正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之所^[18]。具有这样的灵性所在,才是神人栖息之地。因之,李世民通过对晋祠的赞美,对唐叔虞的祭祀,将神与帝王有机地结合起来,宣扬了君权神授思想。李渊父子起兵太原时曾宣誓于晋祠,得到了先人和神人的护佑,故要在晋祠祭虞立碑,要“无言不酬,无德不报”,推而广之^[19]。

同时,《晋祠之铭并序》碑也是李世民价值极高的书法作品,是我国现存较早的行书碑。其中,碑额

飞白“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九字,系我国现存罕见的飞白体,为书法珍品。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多年临摹其墨迹,又经虞世南、褚遂良等书法名家指点,其书法水平自然极高。从其《晋祠之铭并序》碑看,其笔法、笔势、笔意等方面基本上继承了王羲之之衣钵,并在用笔、使转、结体等方面均有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李世民《晋祠之铭并序》碑现存于晋祠贞观宝翰亭。由于庇护唐碑的贞观宝翰亭的年久失修和风雨侵蚀等原因,碑刻的下部文字多剥蚀难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太原县知事周宽与原翰林院编修杨二酉为保护这一名碑,邀请名家杨增摹原碑拓片,重刻《晋祠之铭并序》碑,并置于原碑旁,使原碑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自唐太宗驾幸晋祠御制御文之后,晋祠愈来愈显称中外。当时,皇家贵族、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对晋祠顶礼膜拜。

总之,李唐王朝发迹于晋阳,李世民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以一戎衣成就帝王大业;又幸晋祠,亲书《晋祠之铭并序》,一则报享神恩,二则宣扬了治国理政的思想,可谓以一篇文章而垂千古。故清代大学者朱彝宗集杜甫诗“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20]为联来颂扬李世民政治武功之伟绩。

四、武则天与晋祠《华严经》石刻

武则天(624—705年),名曌,并州(太原)文水人。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唐”为“周”,年号为“天授”。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著名的政治家。

武皇极崇佛教。据载,其称帝前曾陪唐高宗李治到晋阳礼拜童子寺、开化寺,并敕州官长吏整修佛像,捐出袈裟^[21]。稍后,又施助脂粉钱两万贯,并派人在洛阳龙门开凿了举世闻名的大卢舍那佛像,供人崇拜,为其日后称帝大造声势。称帝后,为弘扬华严宗佛法,特聘于阗国(今属新疆南部)高僧实叉难陀到洛阳主译《华严经》。《华严经》为佛教著名经典,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这套佛经在武周圣历二年(699年)译成八十卷汉文《华严经》后,武则天于圣历三年又令经生吕仙乔等在晋阳书丹,将经文刻于100多幢石上,而卷尾则刻有武皇亲笔撰写的《华严经》序。

《华严经》刻成石经后,按理推测,可能由武皇派人将此存放于佛寺中保存。但存放于何处佛寺至今仍是谜。据说可能存放于晋阳蒙山的法华寺(开



晋祠周柏



“惠普桐封”匾(清同治帝题)

化寺),也可能存放于唐高祖武德五年创建的位于晋祠南面的晋阳大佛寺奉圣寺内。但在五代十国兵荒马乱年间,法华寺和奉圣寺均遭到破坏,《华严经》石刻也受到损失,北汉时曾予补刻。但不知何时,石经突然置于晋祠西北十里许的风峪沟太原风洞(今太原市晋源果树场内)。从此,这套石经不再为人所知。

至清初,石经被人发现。清康熙五年(1666年),学者朱彝尊曾入洞考察,并作了详细的记载,石经才渐被人所重视。抗战时期,日寇将此盗出,装运到车上,企图窃运于日本。幸得当地民众奋力抢救,及时运到晋祠保存。1943年,石经主要堆放于晋祠唐叔虞祠两廊下,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晋祠工作人员又将散落在别处的部分石经收藏于晋祠,并进行了数次整理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随着晋祠奉圣禅寺的重建,《华严经》石刻重新陈列保存于此。这样,《华严经》石刻终于重归故地,完璧归赵,也算了却了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夙愿。所以《华严经》石刻又称“晋祠藏风峪《华严经》石刻”,简称风峪石经、华严石经。

《华严经》石刻现存120余通,其中完整的60余通陈列于奉圣禅寺碑廊内。石经多呈柱体形,高约0.8~1.3米,宽约0.35~0.55米,厚0.2~0.4米。文字主要有楷书、隶书两种体例,也偶见草书。武则天创立的19个文字在碑文中大多可以找到。

晋祠藏风峪《华严经》石刻,是传世唐译本八十卷《华严经》最古老及最完整的石刻孤本,不仅是研究佛经经典、佛教宗派起源和甄别六十与八十卷《华严经》版本的珍贵实物资料,而且是研究唐代书法艺术的珍贵文物。

武则天作序的这套石经现已同李世民《晋祠之铭并序》碑一样成为晋祠的镇祠之宝,大大提高了晋祠在国内外的声誉。

五、宋太宗赵光义与晋祠

晋祠的命运发展至宋代时有了重大改变。第一,唐叔虞祠作为晋祠的主祠逐渐被圣母殿所代替,其祭祀的主要对象也由唐叔虞变为圣母邑姜;第二,以圣母殿为中心的中轴线格局逐步形成。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是北宋建国后的第十九个年头,宋太宗赵光义亲率五路大军第三次围攻北方的最后一个战略城市晋阳^[22]。宋军从四面合攻,昼夜不止。经四个多月的血战,才攻下了晋阳。宋太宗总结了李渊父子和五代三主^[23]及北汉皇帝刘崇或发迹或称帝于晋阳的历史经验,为了斩除晋阳这一龙脉,用大火焚烧了这座始建于公元前497年前的千年古城,又于次年四月引汾水、晋水荡平晋阳城废墟,晋阳故城从此化为乌有。

赵光义毁灭晋阳后,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令潘美在原阳曲县的唐明镇建了一座新城,也称阳曲县城。此为今太原前身,距今也有1027年。赵光义毁灭晋阳城后,晋阳城附近的晋祠名胜也不同程度的遭到损毁,劫后余生,满目荒凉,再难见到当年繁荣兴盛的景象。为平息民怨,自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起,赵光义责成地方官员用了五年的时间整修晋祠。如,重建了唐叔虞祠正殿,即圣母殿,将圣母与唐叔虞合二为一祭祀之。太平兴国九年(984年),晋祠整修工作基本告一段落,赵光义想效法唐太宗树碑立石,以夸耀其统一大业之伟绩,名流千古。但苦无唐太宗李世民之文才,只好敕令进士职方员外赵昌言撰文、翰林员张仁庆书丹,树起《新修晋祠碑铭并序》碑,这就是后人称之为的《太平兴国碑》。然原碑至今难以寻觅。有人认为晋祠胜瀛楼北侧所立的“无字碑”即为此碑,实际并非如此^[24]。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此碑尚在,只是碑字多已剥落,局部尚可辨识^[25]。诚然,原碑今已无法见到,但碑文经千百年

的流传仍被保存下来,真是幸事。碑文夸大其辞,既表彰夸耀了赵氏兄弟建立大宋的功绩,又从君权神授的角度论证了赵光义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从碑文看,新修后的唐叔虞祠是:“观夫正殿中启,长廊周布。连甍盖日……巨栋横空……万拱星攒,千楹藻耀。……前临曲沼,泉源鉴澈于百寻;后拥危峰,山岫屏开于万仞。”显然,从规模上看,应是圣母殿建筑;从位置上看,当是唐叔虞祠主殿。由此,圣母、叔虞当祀于一祠或一殿。所以,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太原知县周在浚考证:“今日之圣母殿,实叔虞故祠焉。”^[26]这样,圣母殿取代唐叔虞祠成为晋祠的主体建筑和以圣母邑姜取代唐叔虞成为晋祠的主祀对象逐步形成,也为以后以圣母殿为中轴线的建筑格局的逐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六、简论帝王对

晋祠的册封和晋祠称谓的变化

晋祠因祭祀晋国首任诸侯唐叔虞而名。自北魏称唐叔虞祠以来,晋祠之名屡有变更,并多次得到帝王的封赐。这种封赐是帝王们为适应封建统治的政治要求而做出的主观选择,是有其客观的社会根源的。

酈道元于北魏正光二年(521年)所著《水经注》称晋祠为唐叔虞祠:“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此为历史上最早对晋祠的记载,足见当时唐叔虞祠已为晋阳之胜地了。至东魏(534—550年)时,文学家祖鸿勋曾应权臣高欢的征聘至晋阳作了一篇著名的《晋祠记》^[27],祠称晋祠。北齐天保五年(554年),魏收所撰《魏书》则称之为晋王祠,其《地形志》载:“晋阳西南有悬瓮山,晋水所出,东入汾,有晋王祠。”此时,北齐皇帝高洋在晋阳周围开凿佛寺,大修晋祠。三十年间,三个政权对晋祠竟有三种称谓,足见晋祠之名已引起帝王的重视。果然,北齐后主高纬崇尚佛法,于天统五年(569年)下诏改称晋祠为“大崇皇寺”^[28],使单纯祭祀叔虞的晋祠增添了佛教的色彩。这是封建帝王第一次正式对晋祠之名的册封。应当说“晋王祠”、“大崇皇寺”是晋祠的官称,而“晋祠”是晋王祠的简称和习称,“唐叔虞祠”则是晋祠的本祠。

唐武德五年(622年),鄂国公尉迟敬德奉敕将其在晋阳的别墅创建为寺,高祖李渊赐寺名为“十方奉圣禅寺”。奉圣寺位于晋祠的南部,“北临唐叔之古祠,南有台骀之遗迹”,由于得到了皇帝的大力



圣母殿侧面

推崇,寺院香火极旺,成为晋阳的重要佛寺。故“其烈在唐之世,富贵尊荣,光华烜赫”^[29]。

唐贞观二十年,李世民驾幸晋祠,撰文《晋祠之铭并序》,并刻碑立石,仍称晋祠。由于李世民的御笔御文,晋祠成为一处“沉沉清庙,肃肃灵坛”,从此“英声不匮”^[30]。

五代后晋天福六年(941年),高祖石敬瑭封唐叔虞为兴安王^[31],祠称“兴安王庙”。石敬瑭想以封赐叔虞王号来安抚人心,巩固其统治。

宋代,赵光义毁灭晋阳城后,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下令整修晋祠,创建了圣母殿,将叔虞和叔虞之母邑姜一同供奉。太平兴国九年(984年),赵昌言奉敕撰《新修晋祠碑铭并序》,称祠为晋祠。此后,晋祠的称谓和晋祠所祭之人物唐叔虞和圣母邑姜的封号不断变化,呈现出混乱复杂的局面。

宋代皇帝好封赐,祠庙赐额、封号,多在熙宁、元祐、崇宁、宣和之时。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因晋祠祷雨有灵,邑姜被封为“昭济圣母”,圣母殿被尊称为昭济圣母祠。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太原府发生了强烈地震,“地震弥旬,昼夜不止,坏城壁、屋宇,人畜多死”^[32]。这次地震对圣母殿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所以,崇宁元年(1102年),兼太原军府事孙路奉徽宗之敕重修了圣母殿。崇宁三年六月,徽宗封唐叔虞为“汾东王”,同时“赐号圣母祠慈济庙”。政和元年(1111年),徽宗又加封圣母为“显灵昭济圣母”,“政和二年七月改赐惠远”。故祠又称“汾东王祠”、“惠远庙”^[33]。如此,圣母的地位逐渐确立,又被民间称为水神。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太原知府周景柱游晋祠之后叹曰:“方在唐时,叔虞之祀犹烈。自昭济之号隆,而桐珪受封报功崇德者乃渐而混矣。”^[34]



“惠流三晋”匾(清光绪帝题)

元代,晋祠的称谓有“汾东王祠”和“晋祠”两种。至元四年(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在蒙古军队统一中原的关键时刻,依然“特降优诏”,令地方官员对晋祠“俾加营护”,重修了“殿宇摧毁,神位迫窄”和“祀事废坠”已久的晋祠^[5]。太原路提举学官弋穀为此于至元四年(1267年)撰文树碑《重修汾东王庙记》,称祠为“汾东王庙”。而碑阴同年刻文《晋祠庙宇四至》,记载了地方官员奉忽必烈之诏书整修晋祠,划定晋祠庙宇四至范围一事。诏书称“晋祠庙系祝延圣寿祈福之地”。如此,“晋祠”和“汾东王庙”两种对晋祠的称呼是通用的,难以区分。

明代,晋祠的称谓也有变化。洪武二年(1369年)春夏之交,天旱不雨。明太祖朱元璋派人在各地山川祭祀神灵,求降甘雨,保佑百姓。适逢山西官员杨宪祈祷晋祠圣母,求得霖雨。故朱元璋御制诰文《加封诏书》,封晋祠圣母为“广惠显灵昭济圣母”。晋祠遂称广惠祠。洪武四年(1371年)又改称晋源神祠。景泰二年,明代宗朱祁钰因山西民困、久旱不雨、谷用无成,遂遣太常寺寺丞李希安至晋祠祭祀圣母,祈望圣母广布霖雨,大作丰年,故立《御制祝文》碑,仍称晋祠。至成化二十年(1484年)八月,明宪宗朱见深派遣山西都知监太监刘岐山至晋祠祭祀圣母,立《御制祭文》碑,仍称为晋祠。不难看出晋祠所藏明代三位皇帝《加封诏书》、《御制祝文》和《御制祭文》碑都是封建帝王借祈祷晋祠圣母广布霖雨,以求得五谷丰登、四海晏宁,使其统治永固的目的。此时,晋祠圣母已被广泛尊为水神并且完全取代了叔虞成为晋祠祭祀的主神了,唐叔虞反而退居次要地位了。

清代时,仍称晋祠。清代皇帝对晋祠的重视,远未及前朝历代。仅为晋祠题了数块牌匾而已。如,同治皇帝题“惠洽桐封”、“惠普桐封”两匾,光绪皇帝题

“惠流三晋”匾,慈禧太后题“三晋遗封”、“勤俭训俗”匾。后三匾据说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逃跑时途经太原晋祠时所题(待考)。这些碑皆缅怀叔虞封唐后造福晋国的功绩,似为唐叔虞正名,但仍然不能使其超越圣母而恢复其原先的主体地位。

综上,晋祠之名,一以贯之,可谓习称。尽管历代帝王对晋祠屡有赐封,常有更易,终究不能取代“晋祠”这一民间称呼的。历代帝王对晋祠或晋祠所祭之神的册封符合了各自统治的政治需要。如,唐代或唐代以前的帝王对晋祠的营建和封赐一般是以唐叔虞为主要祭祀对象的。因为唐叔虞为唐国诸侯,是周天子所封,所以重视唐叔虞是向普天下之百姓显示其是真龙天子,是符合天意和民心的,即君权神授。至宋太宗赵光义营建晋祠后,随着圣母殿的创建和各朝对圣母的册封,邑姜这位叔虞的母亲经过一番精心包装后成为普降甘霖、雨润众生、庇护百姓的水神和代言人,唐叔虞的主祭地位被圣母所代替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就是宋朝或宋朝以后圣母坐立晋祠逐渐取而代之唐叔虞的内在原因。自然,晋祠多神教的崇拜出现也就正常了。

晋祠是历史的见证者,不仅亲历了晋祠的荣辱,而且也目睹了千百年历史的进程和政治风云的变幻。因此,封建帝王正是通过对晋祠的册封和重视,以祭祀唐叔虞或圣母为出发点,从内容到形式逐渐地完全适应了封建社会各阶层的现行要求,从而弘扬了忠孝仁义、君权神授等封建纲常伦理和“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这也正是晋祠文化所体现出的一个显著特征。

[1] 此说亦可见于《左传·昭公元年》、《吕氏春秋·重

言》。《左传·昭公元年》载：“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吕氏春秋·重言》载：“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桐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封叔虞于晋。”

[2]《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3]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始，考古工作者就致力于寻找晋国的始封地。90年代终于在山西临汾市的翼城县天马村一曲沃县曲村一带，发现和发掘了晋国早期都城遗址和晋侯墓地。北大考古学教授李伯谦先生通过对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出土文物的分析，确认：“晋侯墓地及其所在的天马一曲村遗址所处的地理方位、起始年代、延续年代等都表明，它不是‘穆侯迁絳’之絳，不是‘成侯迁曲沃之曲沃’，也不是所谓燹父徙居之晋，而只能是西周初年叔虞所封之唐”。参见李伯谦《晋国始封地考略》《中国文物报》1993年12月12日第3版。

[4]《史记》卷4《周本纪》载：“晋唐叔得嘉穀（二苗同为一穗），献之成王，成王以归（归，一作馈）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东土，鲁天子之命。”《史记》卷33《鲁周公世家》载：“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母同颖，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

[5]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解燹时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城记》云尧筑也。（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叔虞之子燹父徙居晋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燹父所徙之处，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为坊，城墙北半见在’。《毛诗》谱云‘叔虞子燹父以尧墟南有晋水，改曰晋侯’。”

[6]圣母殿左侧古柏在清光绪年间遭砍伐，但右侧的蟠龙柏仍然郁郁葱葱，2001年据碳14交叉定位法测定，树龄2991年，距今正好是3000年。由此，晋祠创建的年代大抵在周代初年。

[7]唐李百药《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54页。1972年，中华书局。

[8]时为唐初。见《元和郡县志》引姚最《序行记》。原文佚。

[9]此即酈道元《水经注》所言的“凉堂”，今指鱼沼飞梁。

[10]姚最《序行记》，今佚。

[11]《北齐书》卷31《王晞列传》422页。

[12]《北齐书》卷40《唐邕列传》531页。

[13]《北齐书》卷8《后主、幼主帝纪》113页。

[14]《北齐书》卷8《后主、幼主帝纪》113页。“（天统五年）夏四月甲子，诏以并州尚书省为大基圣寺，晋祠为大崇皇寺。”

[15]《旧唐书·太宗本纪》。

[16][17]李世民《过旧宅二首》。

[18]《论语·雍也》。

[19]本段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李世民《晋祠之铭并序》碑文。

[20]清人朱彝尊《唐太宗碑亭题壁集杜句》：“步履深林晓，春池赏不稀。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野日荒荒白，悲风稍稍飞。无由睹雄略，寥落壮心违。”太原晋祠集杜甫诗联：上联集杜甫《偶题》，下联集杜甫《重经昭陵》。

[21]唐释道世《法苑珠林》第14卷，中华书局2003年版。

[22]第一次是宋太祖赵匡胤于开宝二年（969年）率军攻打晋阳，久攻不克；第二次是开宝九年，派大将党进、潘美围攻晋阳，数月不克，赵匡胤却病死于开封。

[23]五代三主是指五代时的后唐主李存勖、后晋主石敬瑭、后汉主刘知远。

[24]该碑正反两面各有碑文，但难以辨认。碑阴为《重修晋祠碑记》，碑正面字则无法识别。

[25]晋祠藏周在浚《重修唐叔虞祠记》碑载：“叔虞祠（东）有太平兴国九年碑。碑字剥落不可辨。中有‘乃眷灵祠’”。

[26]晋祠藏《重修唐叔虞祠记》碑。

[27]《北齐书》卷45《文苑列传》：“高祖曾征（鸿勋）至并州，作《晋祠记》，好事者玩其文。”文佚。

[28]《北齐书》卷8《后主、幼主帝纪》113页。

[29]本段引文参见晋祠藏明皇庆二年王居实撰《重修奉圣寺记》碑。

[30]李世民《晋祠之铭并序》。

[31]《旧五代史》卷79《高祖纪5》：“（天福六年春正月）戊寅，封唐叔虞为兴安王，台骀神为昌宁公。”

[32]《宋史》卷67《五行志》。

[33]本段封号参见《宋会要辑稿》和晋祠碑刻。

[34]晋祠藏《太原晋祠记》碑。

[35]晋祠藏《重修汾东王庙记》碑。

（作者工作单位：太原市晋祠博物馆）